

“科学家集团”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

谢泳

读过《科学救国之梦——任鸿隽文存》（樊洪业、张久春选编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、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）后，我曾与几位朋友有过一次长谈。我说这本书出的太及时了，乍看起来是一件平常事，不过为有贡献的科学先驱出了一本文集而已。但我认为它的意义远不在此。我说它是一个信号，这个信号传达出的重要信息是：这本书的出版，可能带来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学科融合，简单说，因为这本书的出版，有可能出现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科学史、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新融合现象。记得当时的心情，是我联想到了前几年读《胡先骕文存》时的一个感觉。我以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，如果不能把“科学家集团”与一般的“文人集团”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打通，有些问题就解决不了。但现在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是“科学家集团”在科学史领域，而“文人集团”在文学史、思想史领域。虽然有一些交叉，但相对来说融合不够，由于学科分立界限过于刻板，所以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非常专业，而一旦超出学科范围，就难以把握。

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，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，在这个整体中“科学家集团”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贡献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可能还要超过“文人集团”。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在起步阶段的特殊情况造成的，现代学术的许多方法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太密切了，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引进与现代学术方法是同步进行的。

著名的白话文运动，就是一个“科学家”与“文人”争论的结果。现在看来，“科学家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，可能比“文人”更有长远考虑。一般来说“科学家”的主张都相对要稳妥。任鸿隽就说过，他和梅迪生、杨杏佛当时都不完全同意胡适的主张。任鸿隽说：“然白话文言之论战，由吾等数人开之，则确无疑义。”这个事实人们耳熟能详，但其中“科学家”何以反对？它在思想方法上的意义却较少为人注意。还有对日本的态度，“科学家集团”对时局的认识和“文人集团”的差异也很大；“科学家集团”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，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等，与“文人集团”也不同。四十年代，“科学家集团”在政治上的选择，与“文人集团”的选择也耐人寻味。他们通常是思想与行为有较大反差，像任鸿隽、陈衡哲夫妇、竺可桢、杨仲健他们，与胡适、傅斯年在思想上是一个倾向，但在行为上还是做了不同选择。其中虽然有个个人处境不同导致的差异，但最根本的思想倾向，可能是他们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。还有一个现象是“科学家集团”中的重要成员，没有一个去延安的，而文人则不同。

任鸿隽一生，特别注意科学方法对一个人的影响，他总是告诉青年人，不要轻信，要有怀疑态度，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。看这本书时，我常常想，如果我们这辈人是看任鸿隽这样文章长大的，那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他的文章都特别简单，这一点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点，胡适、傅斯年他们都是这样，你不可能从他的文章中解释出歧义来，因为他的话都是最简单的。鲁迅的话就是因为歧义过多，才在“文革”中被人利用，而你要想利用胡适的话，任鸿隽他们的话是不可能的，他们的文章，你很难断章取义，为己所用。最简单的，常常就是最深刻的。

任鸿隽有一篇文章《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》，他说：“我记得民国十四年‘五卅事件’闹得最盛的时候，某大学的墙壁上，贴满了‘打倒英国’和‘直捣英伦’等等标语。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，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。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，我们学生界的标语，是要‘枪毙田中’。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，又何至于有‘济南事件’。最近去年‘九一八’事变之后，我们学生界的主张，有组织‘东亚大同盟’、‘联合东亚弱小民族’等等。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。”这些话真是说得好，在民族主义高涨时，只要听这些前辈说几句简单话就可以了，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。

现代学术史上的“科学家集团”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，只是为了说话的明白和方便，主要是指当时中国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知名科学家。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绝对不是只在他们的专业领域，他们差不多都有超出专业领域的贡献，像丁文江、竺可桢、任鸿隽、杨仲健等，他们在文学、思想、教育以及对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，都有独特的贡献。他们活动的主要机关像中央研究院、中基会、中国科学社，再具体到地质调查所、静生生物所、史语所等等，不能只看成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团体，而要作为一个“科学共同体”来评价，因为那些团体里所体现出的个人道德、专业精神、对国家民族、对民主自由、对政党以及时局的看法等等，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，他们的人格和思想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最宝贵的财富。早期“科学家集团”的活动范围与“新月社”有一些重合，除了专业之外，他们在大学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要承载者，在社会中，大体是以《努力周报》、《新月》杂志、《现代评论》、《独立评论》和《观察》周刊为思想言论活动场所的。特别是在《观察》周刊时期，储安平所邀请的撰稿人，就是一个“科学家”和文人学者联合的知识分子集团。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以这个集团为汇集处，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，必须对这几本杂志给予特别注意，如果对这几本杂志不熟悉，就把握不住他们的思想脉络。

可能是因为专业的关系，《科学救国之梦》的编者，把这个线索忽视了。任鸿隽共在《独立评论》上写过38篇文章，是为《独立评论》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，多数用“叔永”的名字发表。编者看到了《独立评论》，但不知为什么只收了任鸿隽《独立评论》上的15篇文章，下面是任鸿隽在《独立评论》所发文章的目录，后面加*号者是收入本书的文章。

《庚款与教育》（2号）*

《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？》（3号）

《停付庚款事件》（4号）*

《再论党化教育》（8号）

《为张学良进一言》（15号）

《故宫博物院的谜》（17号）

《为新入学的新生讲几句话》（19号）*

《农业教育与改良农业》（21、23号）*

《如何解决入川问题》（26号）

《教育改革声中的师范问题》（28号）*

《对于三中全会的希望》（29号）

《“民间疾苦”》（31号）

《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》（39号）*

《热河失败的教训》（44号）

《我们是右派吗?》(48号)
《中国的出路》(56号)
《烦闷与大学教育》(57号)*
《一个关于理科教科书的调查》(61号)*
《造乱与止乱》(64号)
《附答》(66号)*
《技术合作应从何处作起》(68号)
《华北危机的责任》(70号)
《附答》(72号)
《定县平教事业平议》(73号)
《四川军阀的末路》(75号)
《再答闵仁先生》(86号)*
《论所谓择师自由》(87号)*
《南游小识》(102号)
《为全国小学生请命》(109号)
《剿匪中的四川问题》(119号)
《保存古物做的什么?》(126号)
《苏俄外交的一个观察》(130号)
《再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》(136号)*
《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》(158号)*
《国格与人格》(160号)
《四川问题的又一面》(214号)
《关于〈川行琐记〉的几句话》(215号)
《进步的基础》(242号)

还有任鸿隽发表在《观察》周刊上的几篇重要文字，也没有能够收到书里。一篇是《留美学界的几个问题》(2卷11期7页)《追念顾临先生》(2卷14期12页)《为本届大学毕业生进一言》(2卷20期页)。另外储安平编《观察》周刊时，在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，与任鸿隽、陈衡哲夫妇关系最好。储安平给胡适的信中就说过“在先生的朋友中，比较了解我也最鼓励我的，大概要算陈衡哲先生了。”任鸿隽的一首《西江月》在《观察》上就刊出过两次，因为第一次错了两个字。《观察》创办不久。时正在美国的陈衡哲、任鸿隽夫妇分别给储安平写了信，可见他们关系之好。这两封信都很重要，顺手抄出如下：

安平先生：奉读《观察》创刊号及八月三十日来示，敬悉此刊已如期诞降，以先生之精神与努力，定能为我国言论界放一异彩，树一特帜，谨此道贺。隽等抵美后旅行各处，不遑宁居，致无暇为贵刊作文，至以为歉。稍缓当略记所感，以报雅命。此次在太平洋舟中曾有一难得之事，当时曾做小词以记其事，兹录如后。弟任鸿隽顿首，卅五，十，九

几乎同时，陈衡哲也给储安平写了信：

安平先生：到美已有两个月，因办理孩子入校事，奔走各地，未及为大刊作文，然心中实未尝一刻忘怀。日前拜读创刊号中之“我们的志趣和态度”，感到无上欣慰。国事如此，社会一般情形又如彼，若非有后起英秀如先生者，我等之灰心将更无法挽救矣。来信殷殷以哲等之同情为念，感与惭并。哲等之所以感到兴奋，亦是同声相应，欣遇同志耳。哲现暂住Cambridge，孩子幸已顺利上学。自下星期起，即拟开始为国内读者写文，而第一篇定寄大刊以表祝贺钦敬。两位小朋友时时念及，他日如有照片，望寄一张。敬颂撰祉 陈衡哲谨上 卅五，十，五

总之，这是一本好书，但还有一些遗憾，希望日后能有所补正，尽可能把任鸿隽重要的文章都收集起来。因为我比较熟悉《观察》周刊和《独立评论》，所以看出了一些问题。我想，任鸿隽肯定还有其它的文章是我所不知道的，希望日后科学史、文学史、学术史和思想史研究者之间能多沟通，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少一些遗憾。